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八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

王志超
著

史念海，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家，经过几十年的考察学术研究，撰写出《河东集》《中国地理学纲要》等一大批学术论文，开拓了历史地理学新路，树立起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的研究丰碑，他的学术声望，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崇敬，真正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与教育战线的一代宗师和学术大师。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8辑)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

王志超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93-2

G·48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玗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学术救国——奋然踏上治学之路
..... (2)

二、筚路蓝缕——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地
理学 (9)

三、文化重镇——丰富多采的学术贡献
..... (14)

四、有益于世——把学术成果变成现实
生产力 (29)

五、河山之恋——在祖国母亲怀抱里滋
养壮大 (33)

六、学界泰斗——蜚声中外的—代宗师
..... (42)

七、情系黄河——终生不渝的华夏情结
..... (47)

《黄河颂》 (51)

引 子

刘纬毅先生约我给已故山西籍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史念海先生写一篇学术小传，以供三晋文化研究会编辑的《山西历史文化丛书》出版之用。史念海先生是学术大师，我跟他从未谋面晤谈，仅怀有敬仰之情，从哪里入手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我与史念海先生有过几段至今回想起来仍感慨颇多的机缘，就觉得自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便不揣浅陋，欣然允诺，以尽纪念史念海先生之晚辈后学之责！

1987年初，我因要完成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毕业论文，便选定了写《商朝中兴名相传说》这个题目。但由于资料短缺，完成论文难度极大，时任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乔志强教授便叫我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念海先生请教，说史念海先生是我们平陆人，又是史学大家，应当了解传说的情况，我便冒然以一个乡党晚学的名义给史念海先生去了一封信。很快，史念海先生给我回了一封亲笔信，我才知道史念海先生与传说同出一村，真是巧合，但史念海先生说，他对传说也知之甚少，无以教我，其态度之谦虚大大出乎我对想象中的大学者的理解，使我从心底里升腾出一股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从此，我与史念海先生有了书信来往。当我完成近两万字的《商朝中兴名相传说》的毕业论文时，山西大学历史系竟没有一位这方面的

专业指导教师可以担任我的指导教师，无法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我只好另外选写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继承与批判》一文，后来，我的《商朝中兴名相傅说》一文删节发表过，并于2003年8月再充实后收入三晋文化研究会编辑的《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9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更名为《傅说其人及其历史传说》。这其中实有史念海先生点拨之功，难以忘怀。

1988年，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的时候，许多学者提议，请史念海先生加盟指教，经与先生联系，他谦虚地答应作个顾问，以尽绵薄之力。并数次致信三晋文化研究会鼓励指导。2001年3月27日史念海先生以90岁高龄遽然辞世，三晋文化研究会曾发唁电沉痛悼念。

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想乘间去西安拜访史念海先生，一睹中国学术大家的风范，当面承其耳提面命，以了却心仪已久的忘年乡党高谊的心愿，但总因琐事萦身未能成行。史念海先生遽然驾鹤西游，我的老师李裕民先生从西安打来电话告我，我便顿感此竟成历史遗憾了。我遂写下这些粗糙的文字，深感难望先生项背之万一，仅借先生仙逝5周年纪念之机略慰高山仰止之深情！

一、学术救国——奋然踏上治学之路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东方文明大国中国开始全面衰落，西方列强开始肆意瓜分中国，中华民族进入了屈辱的近代

史。面对列强欺凌，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开始奋起抗争，改革政治，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等一系列救国保种的理念和行动应运而生，使中华民族在一次次的抗争中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的不屈篇章，逐渐开辟出了使中华民族即将获得新生的光辉道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史念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奋然踏上学术报国之路的。

1912年6月24日，史念海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大臣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他取字“筱苏”，是寄寓于要他成为像苏轼一样的大文豪。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父亲是史念海最早的启蒙老师，父亲经常用同村的先贤“圣人”傅说的事迹和经历激励史念海。傅说的故事对史念海影响非常深刻，促使他发奋读书。不久，他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送他到茅津镇平陆第三高级小学学习。茅津是黄河在平陆县的一个古老渡口，连接晋豫两省，是山西出入中原的门户和孔道，故而形成一方大镇。每天听着黄河的涛声，史念海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黄河真正印入史念海的脑海，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几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运城第一职业学校，史念海称其为“游学河东”，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河东大地，使其视野逐渐开阔，遂顺利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太原进山中学是一所名校，他在省城求学十分艰辛，但渴望知识的欲望却愈加高炽。1932年，史念海从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从此进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殿堂，并坚定地把从事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作为自

己今后进行终生学术工作的目标和方向。

史念海进入辅仁大学学习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与日俱隆，这缘于辅仁大学当时的一批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大家的教育和引导。据史念海先生讲：当时，“辅仁大学老校长、我国历史学界的权威陈垣先生亲自给我讲课，使我在史学研究上打好基础，尤其在考证上摸索到一些门径”。考证与考据，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一种治学风气，特别是自清朝乾嘉学派形成后，考据学成为有清一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种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治学路径，清末民初的学人多宗于此，没有考据之功，就无法进入治学门槛。陈垣先生就是一位考据学大师，出于对陈垣先生的景仰，史念海对考据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师从名师所修炼的考据学的深厚功底也为他终生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陈垣先生的引导下，史念海选择了《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因为钱大昕是陈垣先生最为钦佩的清代著名大学者，其传世名著是《廿二史考异》，要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路，不了解钱大昕是找不到门户的。钱大昕“以考证见长，在沿革地理方面”的成就和学术地位，“也是被后人公认的，今天的历史地理学是从过去的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史念海选择《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这个课题，就标志着他选定了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个方向，从此就站在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由沿革地理学迈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起点上，从此也就可能登堂入室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学术天空。

但真正把史念海引导到历史地理学研究之路上的引路

人，还应当归功于另一位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史念海回忆说：“我当时如果只受陈垣先生的熏陶，只有钱大昕的沿革地理学的一点影响，也许我只能成为一个单纯研究历史、专长考证的人。我真正走上研究历史地理学的道路，取得今天的一点成绩，不能不归功于另一位历史学界的权威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培养和提携”。史念海由于学习勤奋，天赋极高，在大学四年级时就写出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论文，许多在校和外校的历史名家都很赏识他，因此师生交往就频繁起来，逐渐由师生而师友而成为互相切磋学术的同仁。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先生发现史念海的学术天赋后，于1935年推荐他担任国学大师张国淦先生的学术助手，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开始进行学术实践。1936年，顾颉刚又积极推荐和介绍史念海加入他领导的禹贡学会，这是当时中国最早和影响最大的有关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出版有发行国内外的《禹贡》半月刊杂志。禹贡学会的出现，是中国当时一批爱国学者为了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中国的疆域，反对列强对我国的瓜分而发展起来的，是由爱国学者顾颉刚先生登高一呼而诞生的，因此，加入禹贡学会，史念海便走上了学术救国的爱国主义道路。当时，禹贡学会里已有侯仁之（1911—）、谭其骧（1911—1992）等一批会员，日后，此3人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三杰”，鼎足而立，特别是史念海与谭其骧先生，一个在陕西师范大学，一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被学术界称其为“南谭北史”流誉中国。禹贡学会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很快，顾颉刚先

生又聘任史念海担任《禹贡》半月刊的编辑，真正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被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行径的步步威逼之下，“九一八”东北3省沦陷，瞬间华北危机日益加深，进而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机之中，受禹贡学会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史念海拿起笔，要为学术救国贡献出第一份实力。他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便在顾颉刚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10余万字也是中国现代首部系统的历史地理学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的发凡起例，均出自顾颉刚先生之手，因之出版时署顾颉刚和史念海两人之名，实际的搜集资料与写作，均由史念海独立完成。这部书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这座学术大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而在于它面对国难当头，“当时正值强寇压境，虎视鹰瞵的危殆局势之中”，要走学术救国之路，“年轻学子胸中充溢着光复旧土，还我河山的爱国激情”，由这本书作为寄托而完全表达出来了。书中专辟“鸦片战后疆土的丧失”一章，大声疾呼：我国疆域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奋斗，努力经营发展形成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中华民族，都是中国的！”“光复旧土，还我河山，是在吾人好自为之”。成为表达和激励炎黄子孙奋起抵抗、收复河山的信念的宣言书！

学术救国，在史念海身上已变成了实际行动！对于史念海的学术成就和爱国热情，顾颉刚先生由衷地喜悦，在别人求字而千方百计推脱的情况下，为了鼓励史念海沿着这条道路扎实地、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等《中国疆域沿革

史》于1937年作为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一出版，顾颉刚先生就精心为史念海写下一幅中堂，并亲自送上门去：“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才有事业可言。”一代学术大师的赠言，成了史念海一生的座右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念海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于北平、平凉、榆林、西安、重庆、兰州等地，先后担任过河北通志馆编纂，平凉师范学校教员，1938年任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驻榆林）秘书，1940年到西安任西北文化学社编辑，1941年到四川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恰好顾颉刚先生也在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他便协助顾颉刚先生编辑《文史杂志》，担任副编审。1946年史念海兼任北碚复旦大学副教授，史念海由纯学术研究工作开始转入大学教育之路，从此，教师成了他终生的称号，并由此还引出了他后来积极奔呼吁发起设立“教师节”的一段佳话，后面将专门论及，此不赘述。

在重庆期间，史念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的运河》一书的撰写，于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该书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新局面，更使全书体现出了一个年轻学人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念，把一个爱国学者期待祖国光复后能迅速走上华夏复兴的图强之路的执著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1947年，建校之初的国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先生到处网罗人才，他竭诚邀请老友顾颉刚先生担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顾颉刚先生以在上海事冗难以脱身而推荐史念

海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辛树帜校长欣然予以任用，这说明史念海已经具备了崇高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可以独挡一面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学术重任。

辛树帜校长是学术名家，毛泽东主席曾称其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能为辛树帜校长所倚重，可见史念海已成为造诣极高的学界精英。

新中国成立，史念海欢欣鼓舞，他的学术救国梦想实现了，但他的学术强国、教育兴国之志弥坚。1948年，史念海由兰州大学调任西北大学教授，他于1950年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转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4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0年后随学校一起改称陕西师范大学，仍担任历史系主任，直至于1978年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等几十项专业职务，直到2001年，史念海先生90岁高龄去逝，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研究和教学岗位。五六十年代，他艰苦探索中国历史地理学，撰写并出版了《河山集》第一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等一大批学术论著。70年代以后，他走出书斋，踩出了一条“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之路，并凝炼出了足可为后世法的治学原则——有益于世。80年代以后，他又创立了中国古都学，相继推出了以7卷本《河山集》等为代表的学术精品，而且在历史农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以及有关黄河治理研究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他的学术声望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崇敬，不仅著作等身，且桃李满天下，真正成了中国学术研究与教育战线上的一代宗师和学术大家。

二、筚路蓝缕——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

史念海由于陈垣先生的引导与奖掖走上了从事中国历史学研究道路，又由于顾颉刚先生的培养和提携而进入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从此开始了他尽毕生精力创建和开拓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治学之路，终成一代学术大师。

史念海先生在其《自传》中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顾颉刚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这个学会开宗明义的目的和工作，就是要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其实这个学会的英文译名就已经直截了当地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字了。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迄今为止只知道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学。历史学是社会科学范畴的，而地理学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把历史学与地理学结合起来形成历史地理学自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且必须兼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门学科两种研究本领，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禹贡学会成立的使命，就是要把历史地理学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中发展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但由于战争，禹贡学会没有可能来圆满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仅只开了个头，聚集了一些力量就流产了。尽管如此，史念海参加禹贡学会就等于开始进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滩头阵地，能否向纵深发展，就看他的发展后劲了。

在禹贡学会的引导下，经顾颉刚先生亲自指导，史念海很快就写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疆域沿革史》，为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中国疆域沿革史》全面总结了我国2000多年来沿革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上起大禹治水分州传说时代，下迄民国时期历代之地域分布与政区设置，不仅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还突破了前人所划定的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在有关人口、都城等方面作了考证分析，首开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至今，此书仍是青年学人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必读书和入门书。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边圉不整，强寇压境，虎视鹰瞵，直欲得我而甘心”的危机局面展示给世人，以唤起爱国激情，直抒其爱国胸意，表达出了爱国学者的崇高情操，更可视为教育后世做人与做学问完美结合的典范。

此后，史念海“对于历史地理学锲而不舍，一直不肯放松”，在重庆“编译馆的四年则是”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奠定基础的时期”，他在认真思考后认为：历史地理学不能只限于沿革地理学这样一个范畴，否则就难以说服历史时期的若干地理现象，以及和地理有关的历史事实。另外，历史地理学只有为世所有，才能获得无限的学术生命力。在“我总想为这门学科打开一个新局面”的思想促使下，史念海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历史地理学专著——《中国的运河》一书。其对学术探索的执着与坚韧，可想而知。该书于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它不仅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局面，更使历史地理学从

纯粹的学术研究进而直接为世所用。这两部书的完成，以及在重庆期间发表的其它许多有关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论著，使史念海成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初步形成了他终其一生的治学理念和信条——于世有用。

100 新中国建立后，史念海首先于1953年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程，通过教学实践培养历史地理学人才，促进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向系统化、学科化方向发展。这时，他就开始着手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作为讲义，他已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多年宣讲与修改，期间因“文革”而没有正式出版。）要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构建起它的学术理论框架。要创立和开拓一个新的学科，非一时冲动所能达成，史念海开始对历史地理学的渊源与发展流变进行探索与梳理。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是有悠久渊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脉络清晰的发展过程，找到了这个源头，弄清了这个发展过程，才能构建起这个学科的大厦，因此，他先后写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造性贡献》、《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阎若璩学案》、《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等一系列论文，这些重要论著，对中国历史

地理学的源与流，以及为其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认真剔抉爬梳，全面展示了史念海深厚的学术素养与功底，为其即将创建的学术大厦备就了充足的栋梁之材！到1992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以及煌煌七卷本《河山集》的问世，（《河山集》第1—7卷，分别于1963年和1981年、1988年、1990年、1991年和1997年、1999年，由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400万字）史念海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筑工作基本圆满完成，一个具有完备的学科体系、理论层次及华美结构的学科大厦树立起来了。当然，创立和构建这样一座学术大厦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和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分别以《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各具千秋的学术成果同为这座学术大厦加砖添瓦，贡献了毕生精力，以及一大批从事这个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在为构建这座学术大厦贡献着心力，只是史念海、侯仁之和谭其骧这三个同出禹贡学会一门的三位学者成绩更大，因而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三杰”，而史念海与谭其骧先生尤以“南谭北史”享誉学界。

《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是史念海积数十年学术研究之功，全面展示他对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的卓越贡献的最好证明，它不仅明确划定了新型的历史地理学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在理论上的区别和联系，而且对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这几个中国历史地理

学的主要分支领域都做了系统论述，为新型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出了基本框架。《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的诞生，可以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我国完全树立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辅之以他的煌煌七卷本《河山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便应运而生了。

十年“文革”，史念海“荒疏了好几年”，他为不能进行学术创造和教学而忧心忡忡，尽管不能搞研究和数学，但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学科发展如何拓宽道路，如何使学科建设更加完善，更能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直在他脑海里萦绕，一个学术权威在“靠边站”着时，仍在默默地练着过硬的思想内功。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念海不畏年近花甲，又毅然走出书斋，系统考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同时解决历史文献留下的许多舛错与谬误，把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拓展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路子。等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后，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便像火山喷发一样的汹涌地喷发了出来。时不我待，争分夺秒，史念海学术创造的黄金时期开始了，收获时期来到了！通过他不分昼夜的艰苦劳动，这个共和国的老劳模更使这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学科真正具备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实用价值，从而也使他“有益于世”的治学理念深深地融入到这门学科的发展之中，使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现代科学欲显得青春焕发，光彩照人！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史念海开拓中国历史地理学之路充满艰辛，布满荆棘，但他以90年生命的辉煌，历尽